

逃离与回归：当代青年隐门社交现象的审思与调适

张丹琛

隐门是指隐藏在建筑物中的门，起到保护隐私、贵重物品和生命安全等作用。隐门社交也由此衍生而来，指青年群体隐藏在网络社交媒体中，远离熟人社交，成为网络世界的“隐形人”的社交实践样态。当前，大数据和算法对青年在互联网的浏览行为和搜索行为重新进行着规训和建构。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记录，网络痕迹和数字实践更加电子化和数据化，青年仿佛生存在“超级全景监狱”之中。基于此，不少青年通过调整隐私设置、匿名隐身方式，试图在透明的互联网环境中创设出一片相对的私域。这既是一种避免算法推荐和保护个人隐私的二次匿名手段，又彰显了青年群体由分享式的渴望尽情展现自我转向隐身匿名，寻求自我保护的社交心态。同时，隐门社交本质上是青年群体反算法推荐、反信息泄露、强匿名社交的网络亚文化现象，展露出了数字时代下青年文化价值和情感逻辑的表达方式。随着社会“数字化生存”的深入，隐门社交不仅展现了青年社交行为的变化与演进，更是当代社会青年思想动态发展的折射镜。

一、青年隐门社交的典型表征

社会结构的调整与融合使得青年隐门社交有着鲜明的时代属性和典型表征。具体而言，青年隐门社交的典型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印象整饰，从自我彰显转向防护伪装。在社交第一印象塑造上，青年已逐渐远离个性鲜明的昵称与头像，转而拥抱通用的“保护马甲”。社交平台中的“通讯录推荐”“可能认识的人”和“好友访问记录”等功能，将用户的个人生活活动准确地传递给他们的熟人。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和保护，他们选择加入“匿名”大军，使用平台默认的系统头像和昵称，以此方式将自己隐藏起来，成为一个无个性的群体中的一员。同时，青年的社交语言由彰显自我意识趋向于伪装、敷衍和同化。在以往的互联网社交活动中，人的身体无法在场，参与对话的双方无法获得视觉反馈，对方的情绪需要在文字的猜想中解读。然而，当前社交语言与其背后的思想、情感并不匹配；社交称呼的统一和字斟句酌的文字偏离了交流的真实意图和目的，“宁肯打字、不肯语音”成为青年掩藏真实状态的社交常态。这暴露了青年群体的深层担忧——担心在社交互动中过于真实地表达自己会导致被他人窥探或利用，从而试图在社交场合中保持更多掌控权，不轻易展露自我的真实情感。在社交媒体多方位嵌入大众生活的当下，同化、伪装的社交语言打造了一种有明显壁垒的社交边界法则，将青年群体的真实情感和自我隐藏于背后，使人难以洞察。

二是情绪式微，从其乐融融转向沉默寡言。随着

社交媒体的“高曝光”和朋友圈泛化，社交好友不断扩充，工作中的同事、学习中的伙伴，甚至快递等商家的售后进入了社交圈子，青年向往的“强社交型关系”逐渐变为“弱社交型”关系。社交平台中超过一半的好友都是“点赞之交”或者“沉默群体”，朋友圈已渐渐脱离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甚至“陌生人”圈层。朋友圈本应向外投射渴望链接的需求，但发圈分享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与其在朋友圈风生水起，不如独自过好当下的生活”这类社交心理，本质是青年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不顺畅”，具体表现为因隐私顾虑、关系疏离等原因，拒绝与他人深入交往、避免参与社交活动的倾向。基于环境压力（如信息透明化）、角色压力（如多重社交身份）和情境压力（如陌生人圈层），青年往往选择隐退式的“自救”，以沉默减少社交风险与心理负担。

三是关系嬗变，从“熟人社会”转向虚拟交互。传统“阶段性友谊”不断引发青年对过度情感投入和能力付出所带来的“友情内耗”问题的警觉——这种需要付出大量精力、时间及情感去维系的人际关系，实则带有一定的惩戒性与负累性。为突破以差序格局中“必须满足人情世故”的人际维护模式，当代青年果断转向“临时组搭”，以摆脱维护人情网络的高情感资本和高人力资本消耗。从约饭搭伙延伸到各类活动陪伴、搭子形式愈发多样：“口味相投、饭量平均”的饭搭子，“同等体力、一起拼房”的旅游搭子，“拼夕夕帮忙砍一刀”的穷搭子，“第二杯半价”的奶茶搭子……只要涉及社交需求或合作形式的活动，都能组成对应的“搭子”。这种社交形式允许青年更自主地选择社交伙伴、建立精准关系，既满足了对亲密社交的追求，又赋予了他们对社交边界的掌控权——可灵活选择参与或退出社交关系，拥有更大的自由。

二、青年隐门社交的理论解读与潜在风险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揭示的“异化”现象，为理解青年隐门社交提供了理论视角。青年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虚拟形象”，不断投入时间与情感，却反而陷入“高成本社交”的疲惫与异化。他们为避免信息泄露与利益受损，倾向于减少曝光，以“自利性社交”抵御外部竞争。在流动社会中，青年又通过“搭子”关系快速建立短期而精准的交往，以满足阶段性需求，但这种短期社交在强调效率与独立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时空空与人际关系的异化。

隐门社交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青年自我保护与快速交往的需求，却潜藏多重风险：“无缘社会”的虚假狂欢掩盖了真实情感交流，导致青年在信息喧嚣中反而更为孤独；匿名化与“去责任化”的话语表达助长了网络暴力与道德冷漠，冲击了健康的社交秩序；隐门社交

以功利为导向，使青年关系趋向短期化、表面化，造成“陌生社会”的疏离，阻断精神层面的深度交往；“弱关系”的临时性与碎片化倾向，虽拓展了社交广度，却抑制了群体凝聚与价值共识的生成，削弱了社会的稳定与向心力。

三、青年隐门社交的引导路径

青年隐门社交的出现，折射出数字化生存下的社交困境。它既是青年缓解社交倦怠的权宜选择，又潜藏着虚拟化、碎片化、人情淡漠等问题。因此，对这一现象既不能全盘否定，又不能任其泛化，而应在理解青年心理与需求的基础上，引导其构建积极、自主、真实的交往方式，塑造健康心态与成熟品格。首先，应搭建真情交流平台，引导青年从“隐门”走向“开放”，以青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注重情感交流与思想碰撞的有机结合，重塑青年与他者的交往形态，重构青年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可以通过组织主题交流、角色扮演、情感分享等活动，为青年创造真诚互动的机会；同时，借助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营造沉浸式的真实体验，帮助青年在互动中深化对自我与社会的理解。其次，要弘扬人文温情关怀，推动青年从“开放”走向“互动”。数字匿名虽提供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角色失调与情感冷漠。媒体应积极传播温情关怀文化，以典型事迹释放社会正能量，用敏锐的洞察力和生动的表达方式，将温情关怀文化的精神内核传递给广大青年，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同时，引导青年更多投身现实生活，通过“关系编织”建立社群情感共鸣，修复虚拟社交中被稀释的真诚与信任。最后，需加强社会集体认同，引领青年从“互动”走向“凝聚”。思想政治教育应聚焦“建立全社会共同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通过引导“强关系”的深度交往（如师徒结对），培育青年的共同价值体系与责任意识，进而形成更具向心力的凝聚力共同体。这不仅能缓解青年社交碎片化的困境，更能为国家长远发展汇聚坚实的社会力量。

四、结语

总之，隐门社交是青年个体在数字媒介时代对社交倦怠的反应与实践，虽有助于当代青年暂时放松身心、满足基础情感需求，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交往“联结情感、传递价值”的本真意义。作为提升个体精神品质、塑造正确交往观念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应主动发力，助力青年积极拓展社会关系、调整规范自身交往行为，最终推动整个社会交往实现持续性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逃离与回归：当代青年隐门社交现象的审思与调适”（23HSMY022）的阶段性成果）

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开启文物赋能思政课建设新篇章

尹晓奔

文物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物质载体，不仅见证着国家的发展历程，更凝聚着民族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基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法”）的施行，有效拓展了思政课教学资源的深度与广度，为其注入了鲜活的历史内涵与文化生命力，为文物资源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与制度保障，标志着文物资源支持思想政治教育进入系统化、法治化的新阶段。

一、文物保护力度加强，丰富思政课教学资源

新法在延续以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纳入法律范畴，体现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领域的战略升级。同时，新法将党的文化传承主张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显著增强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权威性与可操作性。

在保护范围方面，新法亦有重要拓展：特别加大对革命文物的重视与支持力度，明确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杰出人物及革命精神相关的遗址、遗物、文献进行系统性保护；针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档案、设置保护标志，并明确管理责任主体；在地下及水下文物密集区域，严格推行考古筑起先行、保护规划前置的管理机制。这些措施共同构筑起更为严密的文物保护网络，让大量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物资源得以更

好存续，为思政课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真实且多元的教学案例与实物资料。

二、文物利用政策优化，赋能思政课教学创新

新法明确提出支持挖掘与阐释文物价值，鼓励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深入研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弘扬，并倡导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文物资源的展示利用水平。近年来，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文物复原、场景重建与交互体验，极大丰富了思政课教学形式。通过数字化手段，学生能够“沉浸式”感受历史情境，增强对理论知识的情感性认识，有效提升学习参与感与获得感。国家文物局与教育部共同推动的“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工作已取得系列实践成果——2024年度公布的优质资源项目名单，涵盖现场教学、教学设计、校园文化、数字传播等新型形式，不仅促进革命文物资源向思政课教学资源的有效转化，更显著增强了课程的教学效果与吸引力。此外，文物机构与文化创意、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领域的跨界合作，进一步拓宽文物资源传播途径；通过影视节目、动漫游戏、线上展览等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文物得以走出库房、走进课堂，实现文化价值的广泛传播与情感共鸣，显著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与实效性。

三、文物法律保障增强，促进跨部门协同育人

新法进一步明确博物馆、纪念馆等文物收藏单位的

公共教育职能，规定其应当为学校和教育机构开展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活动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与专业协助，如开放文物展厅、提供讲解服务等。该规定充分吸纳近年来部门联动发展的有益经验，从立法层面打破文物部门与教育部门间的体制机制壁垒，为资源互通、人员互聘、项目共建提供坚实法律依据。

在新法的引领与保障下，文物不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对象，更成为高校思政教育中动态、有机的教学资源；教育机构与文物单位的合作机制也逐渐从临时性、项目式向常态化、制度化转变。双方依法依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写、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进文物资源融入思政教育体系。而权益关系的进一步明晰也促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投入、政策支持方面加大力度，支持校馆合作开展思政类金课、教学案例库及实践研学项目，全面发挥文物在塑造学生文化自信、历史思维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育人功能。

四、结语

新法为文物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制度环境与发展契机，为思政课创新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力。展望未来，文化与教育部门应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机制，共同推进师资能力培训、教学模式创新与评价体系构建，全面推动文物资源在思政课中的高效整合与有机运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文物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启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依据、价值意蕴与实践指向

杨雅楠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体现了—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与坚定坚守。“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理论根基和实践路径，更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筑牢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一、“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并巩固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思想前提。第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个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必然以其政治上主权国家地位的确立为前提。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重建国家主权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于与旧观念实现彻底决裂，并根据自身特殊性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履行文化使命、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过程。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文明积淀的智慧结晶，为巩固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深厚根基。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这种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内核的精神品格，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使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能够坚守文化立场，保持文化自信。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诸多契合之处。例如，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思想相契合；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社会”愿景精神相通。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为“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证成。第一，该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彻底破解了“西方化、现代化”的迷思，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真正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各国应立足自身实际探索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意蕴

首先，推动党的精神独立性和理论创造性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数智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胜任力与就业能力构建——以四川高校为例

张嘉 康瑞琦

根据“十四五”规划要求，作为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服务支撑，人力资源管理与服务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支撑性产业，需同步匹配产业升级进程，实现自身转型与专业突破。当前，互联网及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扩张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形成新冲击，既有管理模块与运作方式难以适配行业新生态，进而推动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快速增长。本研究选取四川省内5所开设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高校及12家对口企业开展调研，旨在识别高校人才培养的短板与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胜任力要求，搭建数智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胜任力体系，为四川省高校该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实践参考。

一、调研情况

第一，调研目的。通过调研收集四川省内5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当前培养数据，明确毕业生在就业及职业发展过程中对专业技能的核心需求，为构建“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人才能力—就业匹配模型”奠定基础。第二，调研方法。本研究采用访谈法与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调研，获取四川省内5所院校当前实施的人才培养方案，了解其专业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等。第三，调查内容。企业端：聚焦企业基础信息、人力资源供给水平、数智化岗位需求现状，重点调研岗位对象对业者的专业知识框架、技能熟练度、职业核心能力、职业品格及相关证书的硬性要求；高校端：围绕专业教学水平、毕业生职业素养证书持有比例、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构成及实施效果展开调研。第四，调查数据。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76份，数据来源情况如下：同类高校问卷103份，行业企业问卷68份，企业访谈记录5份。上述数据为四川省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数智化背景下构建学生胜任力与就业能力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撑。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企业调研情况
1. 数智化转型下用人需求
从企业实地调研可见，近年来人力资源服务业呈现“业务边界延伸、经营模式创新”的发展态势，人才缺口显著。受数字化转型冲击，人力资源管理的运作流程、业务范畴及管理对象均发生结构性转变。流程层面：数智化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流程既保留标准化运作逻辑，又实现全流程无纸化办公，形成“端到端协同”的组织模式，管理的系统性、可控性与数字化特征显著增强，倒逼从从业者提升数字化工具应用与流程优化能力。对象层面：智能化场景下的服务群体更趋多样，且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趋势，要求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导向，在实现管理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优化员工体验，提升沟通效率与服务耐心。内容层面：数字技术推动人力资源管理

实现了新的升华。党的精神独立性和理论创造性与文化主体性紧密相连、相互促进。一方面，党的精神独立性和理论创造性推动了“两个结合”的进程，使其在文化传承和理论创新中保持自主性和创造性，形成了以“两个结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两个结合”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也带来了党的精神独立性和理论创造性的新升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认同，这使其更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增强理论的中国气派，提高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抵御能力。

其次，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新跃升。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一度造成文化主体性的迷失。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共产党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重建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文化建设，实现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伟大飞跃。

三、“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指向

首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两个结合”的践行者。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维护党在文化事业上的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体现，是确保文化主体性建设正确方向的前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加强文化队伍建设。

其次，坚持守正创新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守正创新包括“守正”与“创新”两个方面。守正是创新的基本前提，创新是守正的重要依托。坚持守正创新，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最后要不断推动新时代背景下的理论创新，主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最后，加强文化交流互鉴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关键环节。巩固文化主体性不等于排斥其他民族文化，加强文化交流互鉴是关键一环。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展现自身文化独特性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互鉴来巩固文化主体性，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坚持中华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其他文明长处，同时加强文化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东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研究——以广西为例

易丽萍

伴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广西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关键节点，而这一定位的落地，需以充足的区域性国际化人才为支撑。培养区域性国际化人才，不仅能助力广西构建新的经济增长点，更能推动其开展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本文将阐述东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并探究完善该类人才培养机制的策略。

一、东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目前，广西在东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领域，存在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首要障碍是人才培养举措难以有效落地：跨境电商经营具有显著的跨时区特征，其核心经营周期与传统标准化课程设置存在矛盾，导致学生难以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经营与客户服务，校企合作多停留表面，未能实现真正的过程嵌入与能力培育。其次，教育资源与行业现实存在较大代际差异：校内实训广泛使用的模拟软件，后台逻辑与平台更新滞后，无法匹配快速变化的实际商务环境，致使学生所学技能难以直接应用于工作场景，弱化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最后，高职院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国际化与前沿性不足：现行教学内容缺乏对东盟国家市场最新贸易法规、平台政策及数字营销趋势的融合，未能与国际行业标准形成系统对接；双语、全英课程占比偏低，考试方式仍侧重理论知识考核，难以有效评价学生在跨文化情境中的综合商业技能。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高质量“双师型”教师短缺：多数教师缺乏跨国电商企业实战经验与深度海外学术交流经历，知识体系与教学能力难以适配快速发展的行业实际需求。

二、完善东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的策略

（一）加强产教融合，实现校企合作模式改革。完

善东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首要任务是加强产学研融合，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在“双高建设”推进过程中，需紧密结合跨境电商行业实际需求，构建新型校企合作关系：高职院校应与跨境电商企业缔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保课程内容与企业实际需求高度契合；通过搭建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等校企合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学生提供真实实习场景与项目训练机会；推行项目制教学、企业导师制等多元实践教学形式，让学生在企业实际工作中积累经验、提升动手能力。同时，需进一步强化广西—东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与评估机制，保障人才培养工作稳定高效推进。

（二）建立健全国际课程体系。东盟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关键在于建立完备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其核心路径是对跨境电商企业供应链所需的知识与能力要素进行系统整合。需在充分调研东盟各国市场特征、数字平台发展现状趋势的基础上，明确面向东盟的人才核心能力——包括市场数据分析能力、跨境电商平台运营能力等。为此，要对标“双高建设”对高职教育的高水平要求，打破传统专业壁垒，推动教学内容模块化、交叉一体化，在东盟市场分析、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等领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主动引入国际先进标准与技术手段，将实际跨境电商运营案例、大数据平台融入教学，以项目化教学提升学生综合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此外，需通过行业企业、毕业生、区域经济发

展等多维度反馈，持续优化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评估标准，确保人才培养与中国—东盟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升级相适配。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完善东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队伍国际化水平。在“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需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核

心工作：制定系统性师资培养方案，定期选派教师赴海外交流学习，拓宽教师国际视野，助力其掌握跨境电商领域前沿知识与技术；鼓励教师到跨境电商企业挂职锻炼，积累实战经验，提升实践教学能力；积极引进具备国际教育背景与跨境电商从业经历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充实教师队伍、优化师资结构。

（四）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人才培养途径。加强国际合作、有计划拓宽人才培养途径，是提升东盟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质量与成效的重要手段，核心是以“双高建设”为平台，推动广西与东盟各国政府机构、高校、龙头企业建立多层次、立体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具体实践中，需重点构建校、校地、校企三方稳定协作机制，通过联合签署人才培养协议，共同制定符合东盟国家产业特征与贸易规律的课程标准与教学资源；积极推进师生双向流动与学分互认，有计划选派师资赴合作院校访学交流，引入东盟专家参与教学科研工作，同时可在东盟开设留学生专班，为学生营造沉浸式跨文化学习氛围。

三、结论

总之，广西具有较好的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基础，但要实现高质量、规模化人才培养，还面临一些困难。为完善东盟跨境电商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必须加强产教融合、建立健全国际化课程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国际合作。这既是广西跨境电商行业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又是提升中国—东盟合作交流水平、推动双边经济发展与全球合作的重要举措。

（作者单位：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经贸与康旅学院。基金项目：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课题项目“‘双高’背景下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研究——以跨境电商为例”（XY2024ZC63））